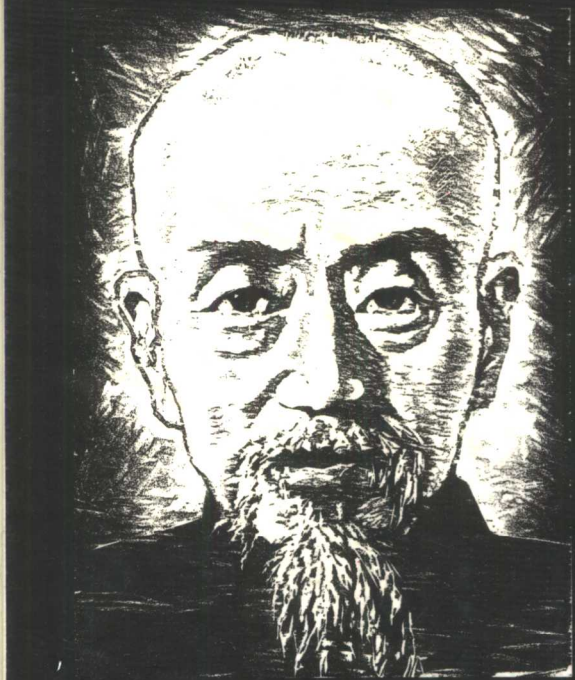




國學大師
叢書
趙樣初題



GUOXUEDASHI

傳評銘鴻辜

國學大師叢書

辜鴻銘評傳

孔慶茂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书 名：辜鸿铭评传

作 者：孔庆茂

特约审稿：陈美林

特约编辑：张德意

责任编辑：钱 宏

封面设计：彭开天 赵焜森

封面肖像木刻：颜 仲

版式设计：王玲云 芝 公

责任印制：罗时彪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8.625 插页：0 字数：20万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8000

ISBN 7-80579-581-9/K·20 定价：16.00元(精)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学大师丛书》

总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觥,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腴,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

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国学大师丛书》

重写近代 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 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癖、佛入中土、道教孳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已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

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九十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 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即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 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

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 宏 (执笔)

1991 年阳春节初稿

1992 年立春节修定

序

陈美林

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发展至近代，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不断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关头，能否闪耀出新的火花，焕发出新的力量，从而为救亡图存作出历史的贡献。这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现实问题，不容忽视也不容回避地出现在具有良知的国人面前，文人亦不例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乃至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一群国学家，他们的目光从传统的国学书斋中，渐次向“天崩地解”的现实延伸，从各自擅长的或汉学或宋学、或古文学派或今文学派向前拓展，或以传统的训诂考据或以西洋的思辨实证入手，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来思考这一问题，并力图作出圆满的回答。他们的言论既表述出各自的观点，又体现出共同的时代特色。他们面对这一严峻问题所做出的答卷，也就是他们各自的学术建树，为自己在近代学术史上获得了各自应有的地位。

然而，与这群国学大师同时代的辜鸿铭，虽然

他曾致力“用传统的中国文明连结于一种理解和阐释现代欧洲文明扩张进步理念的心向”，^①虽然他的学术活动受到西人的重视程度远在康、梁之上，甚至成为我国最早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然而在有关近代学术史上他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作为国学家的他似乎已被人们淡忘。在他去世60余年后，“国学大师丛书”首次将其选定为传主之一，出版他的传记，这不能不说是这套“丛书”编委们慧眼独具。

1

辜 鸿铭原是一个不该被遗忘而竟遭遗忘的学者，这并非纯属偶然，也并不能完全归罪于世人的不公道。寻根究源，是时代潮流使然，是个人气质使然，换言之，是辜氏之思想性格与历史趋势的矛盾使然。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学人震惊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后，继而又欲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某些制度，提出所谓“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主张，企图借以重振中华帝国。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变法维新思潮又弥漫朝野，向西方学习乃成为时代潮流大势所趋。在这种形势下，辜鸿铭却逆流而上，热烈赞扬中国固有文化（包括其中的落后事物），激烈抨击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然是极不合时宜的。故而被世人将其与徐桐、曾廉、文悌辈视为一体，被目为封建顽固派而遭到猛烈抨击。平心而论，对他的批评也不能说全无道理。然而，封建顽固派的“桂冠”与其生终始，从其去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仍然未被摘除，则对之又未免失之公允，如今该是重新审视之日了。

如果我们全面研究他的著述，深入探讨他的思想，就会发现，

^① 辜鸿铭著《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虽然其在反对西方的态度上与徐、曾、文等顽固派极为相似，然而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思维方式来说，辜氏与徐、曾、文等辈都全然不同，绝不可将他们混为一谈，等同视之。作为顽固派的封建官僚徐、曾、文等辈，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无认识，全然不知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和价值，只是出自其维护天朝大国的优越地位而夜郎自大式的盲目排斥。因此，他们对西方的指责并不能中其鹄的，因而也就无甚意义可言。辜鸿铭则不同，他自幼生长于西方，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耳濡目染的全是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回归祖国后，又日熏月染地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他对东西方文明都有深切的了解，对西方文明的弊端也有极为透彻的洞察。因而他不主张放弃中国传统的文明，反对盲目地学习西方，不赞成全盘西化，走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相同的道路，认为中国文化完全能够振兴国家。细加辨别，辜氏的一生思想主张，也不能说完全无可取之处。相反，由于他对西方文明的深刻理解，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抨击，倒是常常切中要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极大的摧毁作用，自由主义蔓延、无政府主义泛滥、人际关系的商品化，这些都使得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与保守主义思想影响而又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辜氏的极度不满，尤其是由于资本的积累与输出而必然导致的对内剥削与对外侵略的强权政治，更遭到他的竭力抨击。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藉科学技术的优势、船坚炮利的武力，为争夺市场而发动的战争，更持厌恶的态度，并进而对西方文明由怀疑而反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辜氏这一态度更其鲜明，他向在北京的欧洲人发表演说，分析欧战的原因，为西方寻找出路。他认为，西方已陷入两难境地，作为人们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已丧失其约束力，社会的安定只能依赖军队和警察来维持，长此以往，武力崇拜将取代社会文明；反之，如果取消军队和警察，无政府主义者同样会毁灭社会文明。在这种进退维谷

的局面下，欧洲的出路究竟何在？他认为西方只有汲取中国传统文明才能弭此祸端。^①辜氏如此见解和言论，正适应了极度厌战的西方人民的心态，尤其是在战败国德国，反响更为强烈。他们从辜氏的言论和著作中似乎发现了人类生存的希望。于是，辜鸿铭的著作几乎全被译成德文，并由诸多名家作序，在许多大书店的橱窗陈列，评论他的著述的文章也纷纷面世，对之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专门研究辜氏思想的机构或活动也相应成立和展开，他的著作甚至成为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等哲学课程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他的一些言论被一些学人引为自己文章的重要论据。总之，辜氏此时被西方视作东方文化的代言人，享有极高的声誉。

可是，与其饮誉西方的同时，在国内的辜氏却遭到极大的冷落，甚至受到无情的抨击。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的。他强调中国传统文明，却不问精华糟粕，拥护男子纳妾、女子缠足，在社会渐次进入西装革履面向西方之际，他却瓜皮小帽、辫子长衫，守旧复辟的种种怪诞行径，将自己定位于顽固派之列。在时代洪流滚滚而下的激浪中，他这一颗也曾一度闪烁光彩的巨星，自然也就被时代抛落，寂灭无闻。不过，他的际遇较之印度的甘地等人来说，也未免相差太远。他们几乎同时留学英国，同时受到同一批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影响，虽然二人国别不同，但都生活在遭受西方列强践踏的东方国度。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同样都是以弘扬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而且也同样受到当时本国激进分子的指责和抨击，但他们在各自国家内的声誉却截然相反。甘地虽被刺杀，但被印度人民视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而辜鸿铭不但没有像甘地那样得到社会丝毫的赞誉，至今在大多数对其不了解或了解不深的人的心目中，仍然只是一个“怪诞”的

^① 《春秋大义》附录《战争与出路》。